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参考資料

(三)

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

中共中央高級党校

一九六三年五月

目 录

选举前的策略.....	8
“航运补助金案”.....	14
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放弃对《社会民主党人报》的领导.....	20
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的最后几年.....	25
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的废除.....	29
胜利的选举.....	33
恩格斯发表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	39
爱尔福特代表大会.....	46
福尔马尔的右倾机会主义言论；柏林代表大会.....	54
法兰克福代表大会.....	58
恩格斯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最后的指示.....	66

恩格斯在一八八三——一八九五年同 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的斗争

〔苏〕B.A.斯米尔诺娃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指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欧洲各国和美国的经济与政治发展情况。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在继续完成马克思的著作和他自己的著作时，同样对各个国家以及整个欧洲的历史发展作了分析。他在自己的论文里，很注意德国、法国、英国、俄国以及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国的情况。但是恩格斯把自己的大部分论文用来分析德国发展的历史道路，分析德国的经济和政治情况——德国是他的不幸的祖国，是“强力的铁血政策”受到标榜、反动的普鲁士主义取得胜利的国家，德国人民的伟大儿子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从这个国家被驱逐出境的。

在普鲁士主义和容克贵族的德意志，军事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紧紧地搅在一起，资产阶级懦弱无能，警察制度和沙文主义的猖狂横行，武器的碰撞声以及强制军事训练和军事检阅的叫嚣从未停息。因此，在充满最腐败的小资产阶级庸俗习气的条件下开展起来的广大、雄伟的工人运动，就需要特别引起注意，并给予认真分析和经常指导。恩格斯对德国是特别注意的，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经过三十年连续不断的斗争和牺牲，而争得了一种在世界上还没有另外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所曾有过的地位，这种地位将保证政权在不久的将来会转到它的手里。社会主义的德国在国际工人运

动中站在最先进、最光荣和最重要的岗位上；它的义务就是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以保卫这个岗位不受任何侵犯！”①恩格斯相信德国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很快会取得胜利，这一胜利将会把无产阶级所深恶痛绝的普鲁士主义德国连同它的反动君主政体一齐消灭。

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深信，革命不仅可能在德国、而且也可能在俄国取得胜利。恩格斯甚至在他的晚年曾经不止一次地写道：如果在俄国爆发革命，那末俾斯麦也会完蛋。一八八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恩格斯在写给弗·阿·左尔格的信中说：“在德国，迫害事件层出不穷。俾斯麦好象是想把一切都准备好，以便在最近几个月内就会发生的俄国革命一旦爆发的时候，德国马上可以仿照俄国的例子去做。”②

显然，恩格斯错误地估计了德国爆发革命的时机。德国的历史发展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反动的普鲁士主义在征服了德国人民之后，蜕变为现代法西斯主义；这是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最可憎的产物。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充满信心，他们毕生同反动的普鲁士主义、同普鲁士容克的掠夺企图进行了无情的斗争。同时，他们为未来的革命斗争教育了社会民主党和工人阶级。

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了错误的估计。列宁在《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人书信集》俄译本序言中写道：“这几个月原来很久很久才来到。毫无疑问，这样一定会有一些庸人要出来装着一副懊恼的样子，严厉指责恩格斯的‘革命主义’，或者用傲慢态度来讥笑这位亡命国外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部分，第24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给美国人的信》，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18页。

老革命家的一些旧的空想。”①列宁继续写道：“是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估计革命时机很快到来这一点上，在希望革命（……）获得胜利这一点上（……），有许多错误，而且常常犯错误。他们一八七一年也犯了错误，他们当时一心一意想‘把法国南部发动起来，他们（……）为此牺牲了一个人所能牺牲的一切，冒了一个人所能冒的一切危险’，……”②但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促进革命，为了准备革命，畢生都进行非常紧张的活动；“……一直在努力提高并且已经提高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水平，使他们超出日常细小的任务范围的两个伟大的革命思想家所犯的这种错误，同大叫大嚷、信口开河，妄说革命是无谓忙碌，革命斗争徒劳无益……的那些官场自由派的拙劣的智慧比较起来，要高尚千倍，伟大千倍，在历史上宝贵千倍，正确千倍……让那些在革命方面没有行动的庸夫们以不犯错误而自夸吧”③，而伟大的思想家、热忱的无产阶级领袖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自始至终都作为一个革命者在行动着。

德国社会民主党十九世纪末曾是一支强大的力量。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一八七八年十月二十一日）迫使德国社会民主党转入地下状态。虽然受到狂暴的镇压，没有集会和结社的权利，几乎丧失了机关报，德国社会民主党却没有终止它的活动。党只剩下了两家报纸：一在纽伦堡，一在奥芬巴赫；社会民主党最大的机关报《前进报》、《柏林自由新闻》和《汉堡国民报》被查封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学会了把合法斗争同不合法斗争结合起来的斗争方式，继续加强着它同群众的联系。

政府（一八八六年四月十一日）颁布了禁止罢工的法令。一个

① 《列宁全集》第12卷，第362页。

② 同上，第362页。

③ 同上，第362—363页。

月之后接着又頒布了一个法令，規定在警察的許可下才能召开工人會議，也就是說实际上禁止了工人集会。但是，禁止尽管禁止，經常的罢工仍然不让俾斯麦政府得到安宁。党在瑞士出版了它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

虽然政府曾宣布訂购或收藏《社会民主党人报》为危害国家的犯罪行为，但是，不顾政府的一切法令和警察的阻截，党的中央机关报非常准时地在德國銷售一万份以上。被迫害的報紙嘲笑帝国主义的警察說：“最凶狠的猛兽宣布自己无能对付那以无畏的歌声触怒了它的紅尾鳥”。

据大概的估算，在实施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期間（从一八七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到一八九〇年十月一日），被查禁了一千三百种定期和不定期的出版物和三百零二个工人組織，从戒严的各区里放逐了大約九百名社会民主党活动家，法院的判决书共宣判了一千年的监禁和劳役。

秘密工作与直到利用国会讲坛的各种可能的公开活动相結合，使党的力量加强了，扩大了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在頒布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以前，党拥有四十二种政治性報紙，在国会选举中它的候选人得到了四十三万七千一百五十三张选票，职工会拥有五万會員和十四个机关报。在废除“非常法”的前夕（一八九〇年十月一日）党出版了六十种政治性報紙，在一八八四年的国会选举中，党的候选人得到了五十五万票，一八八七年得到了七十六万三千票，而一八九〇年二月二十日已經有一百四十二万七千八百九十三名选民投票贊成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职工会拥有二十万會員，并且有了四十一个机关报。

俾斯麦希望用来安撫工人階級的可怜的小恩小惠（諸如疾病、养老、残废和意外保险法之类），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八十年代

末，工人运动开始了新的普遍高涨。一八八九年爆发了鲁尔地区十多万多名矿工的大罢工。工人集会是用秘密接头的方式召集的。工人们向前来驱散集会的警察说：“我们鄙视你们的法令。”

一八九〇年，政府在日益发展的无产阶级运动的压力下被迫废除“非常法”。党和职工会争取到了合法存在的条件。

实施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期间的活动证明了议会斗争方式对于工人阶级的重要性。正如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所作的序言中说的，普选权使党有可能每三年检查一次自己的力量。“它给我们提供关于我们自身力量和各敌方党派力量的精确情报，从而给予了我们一根能估计到我们行动的绝妙的比例尺。”①普选权使党有可能扩大它同群众的联系并向他们阐明党的口号。恩格斯继续说道：“它在国会里给了我们的代表以讲坛，我们的代表在这讲坛上可以比在报刊上和集会上更有威望地和更自由地向国会中的敌人和国会外的群众讲话。”②

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未能以革命方式利用国会的讲坛。党的领袖们有过高估计议会斗争意义的倾向，认为议会斗争自身具有独立的首要的作用，而忘记了：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主要的是议会外的群众斗争。因为这个缘故，国会党团获得了过大的权力，它实际上把党中央机关报的编辑部置于自己管辖之下并起着党中央委员会的作用。这个党团的成员中充塞着企图同左翼资产阶级政党谋求无原则妥协的小资产阶级分子。

在实施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的最初几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既同恩格斯所说的那些在国会里力求采用各种为革命者所不齿的手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莫斯科1954年中文版，第106页。

② 同上，第107页。

段“乞求废除‘非常法’”的右傾机会主义者作斗争，又同当时以約翰·莫斯特为中心聚集起来的半无政府主义分子作斗争，这个約翰·莫斯特在自己的《自由报》上进行了疯狂的反对党的领导的宣传；这种宣传，按照馬克思的說法，“……已經不是对个人的攻击，而是对整个德国工人运动的誣蔑”。

从一八八三年三月起，恩格斯单独地同后来已經是以“青年派”的名义出現的半无政府主义者，同右傾机会主义者及其“議会迷”（馬克思在他一八七九年九月十九日給弗·阿·左尔格的信里用的字眼）繼續进行斗争。

恩格斯的信，主要是写給奧·倍倍尔、威·李卜克內西的信，以及写給保·辛格尔、爱·伯恩施坦、卡·考茨基等人的信，証明他曾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作过多次指示。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按选举区建立組織的。党的一切工作，無論是組織工作还是宣传工作，首先是同国会以及地方自治議会的选举运动相联系的。这种情况为国会党团中企图把党的全部工作集中于党团周围的那部分人創造了有利条件。在实施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期間，党团（根据党的維丁代表大会一八八〇年八月二十日——二十三日所作的決議，承认社会民主党的国会党团为党的领导机关）起着党中央委员会的作用，它把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置于它的管轄之下。正是党团的这部分人滾进了机会主义的立場，忘記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的阶级斗争。

虽然党还处在地下状态，但是圍繞着国会选举并在国会党团的领导下进行的这种集中性的活动，却在党团中造成了一种关于党在国会里合法活动的意义被夸大了的印象。恩格斯完全正确地批判了党员群众中那种脱离真正革命活动的行为，批判了曾經使甚至象威廉·李卜克內西这样經過考驗的“革命战士”都受其影响的党团中

一部分人的机会主义思想。恩格斯警惕地注视着党团的活动，注视着它在国会里的行为，使它不致陷入自由资产阶级的圈套。但是恩格斯也看到，在群众中存在着从未停息的真正的革命活动，这种革命活动不允许党的领导陷入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

恩格斯根据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的决议看到了这次会上的斗争，“从文件的字里行间了解到一些问题。”代表大会完全同意国会党团的活动，不过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党采取“坚决无情的行动方式”，不能对统治阶级的宽容态度抱任何希望，拒绝同政府作任何妥协。代表大会正确地估计了俾斯麦为迫使无产阶级放弃彻底革命的阶级斗争而设的所谓社会改革这个收买工人阶级的甘饵。这项决议，以及对由恩格斯指导其政治与策略路线的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活动的赞同，向恩格斯表明，在代表了党的绝大多数地区的参加大会的六十名代表中，革命派占着优势。

党的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一八八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四月二日）的工作未能使恩格斯完全满意；大会后他看出，党的右翼离开马克思主义立场越来越远。恩格斯在一八八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对日内瓦他的老朋友约·菲·贝克尔写道：“完全摆脱这批烂污货还未能做到，但是运动终于重新明确地走上革命轨道。群众几乎比所有的领袖都强得多，正是这一点，对我们的人来说是件大好事；现在，当反社会主义者法迫使群众以自己的力量来开展运动，而领袖的影响已缩小到最低限度的时候，事情进行得比任何时候都更顺利。”①恩格斯知道党内存在着右翼，但认为在实施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的时候，“在我们还不能直接面对群众的时候”，同他们决裂是不适宜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7卷，第312页。

从德国发出的关于党务的情报令人确信：党员群众是跟着倍倍尔和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走的，他们坚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但是恩格斯警告倍倍尔和考茨基说，在可能产生分裂之前，在有可能把这些老爷们驱逐出党之前，应当准备好有关的材料，“……使他們不能用虚伪的托詞进行迴避”^①（一八八三年九月十八日致考茨基的信）。

选举前的策略

一八八三年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说是勇往迈进、紧张战斗的一年。九月三十日，实施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的期限届满。十月二十八日举行了国会选举。党继续处于地下状态。

这一年党所面临的任务是：制订竞选的策略，组织选举前的宣传运动，为支持党的候选人进行斗争。

恩格斯在通信中同奥·倍倍尔、同《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爱·伯恩施坦、《新时代》杂志编辑卡·考茨基商讨了党最关心的同资产阶级政党可能达成的选举协议问题、政治宣传和选举策略问题、下届党团的成员问题。党可能分裂以及党的机会主义右翼的行为问题仍然是个迫切的问题。

选举前最重要的策略问题之一，是在国会改选中可能同资产阶级政党达成协议的问题。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以三十四票对二十四票否决了在改选时和资产阶级政党达成协议的议案。但是由于选举即将到来，这个问题仍然使党感到焦虑。五月间，保尔·辛格尔曾前往伦敦向恩格斯征询关于选举前策略问题的意见。恩格斯根据当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7卷，第330页。

的具体情况，首先提出了策略上的灵活性；他强调指出，必須在选举每一个国会議員时同資產階級政党进行斗争。例如，在柏林主要是社会民主党和进步党人之間的斗争，恩格斯建議同进步党人达成关于划分地区的協議；在某些地区，主要在工人区，进步党人把席位让給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而在另一些进步党人可能取得更大胜利的地区，社会民主党就不再进行选举前的活动；“……但是，这种情形当然只限于估計協議將能得到履行的場合”①——这是恩格斯一八八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在写給爱·伯恩施坦的信中說的。早在一八八四年初（二月十二日左右），恩格斯就根据这个理由写道：“我只能讲，在一定的条件下，我可能会贊同和一些并不完全站在革命的共产主义立場上的人联合行动，如果他們值得联合的話；但是，無論如何也不会贊同和他們結成联盟”②。

临时联合問題的提出只能是为了无产階級政党的利益，而且只能同站在自由民主立場上的政治团体或政党联合，而不能同反动政党联合；同时，只有在向黨員群众和选民充分明确和公开宣布联合的理由与協議的临时性質的条件下，才能談到临时協議問題。

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根据恩格斯的指示，討論了选举前的策略問題。一八八四年八月七日編輯部发表了威·李卜克内西探討同資產階級政党达成協議的可能性問題的文章《論选举前的策略》。李卜克内西写道：“在国会改选时，如果同激进的資產階級分子达成協議对党有利，我們可以允許同这些政党达成協議，但是，虽然如此，却在任何条件下也不允許同保守党人达成協議。”③

由于对竞选运动的恐惧，担心社会民主党对选民群众的影响，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7卷，第377頁。

② 同上，第353頁。

③ 《社会民主党人报》1884年第32号。

俾斯麦把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又延长了一年（五月十日以一百八十九票对一百五十七票通过）；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在表决延长以后被称做所谓“爆炸法”（反对使用爆炸物进行犯罪和危害社会的法律）。俾斯麦企图用“甘餌”政策——制訂疾病和意外事故保险法，把这一“镇压”政策变得温和些，俾斯麦企图把社会民主党限制在地下状态，削弱工人阶级政党，从而使工人选民和它分离，而把他自己的那套模稜两可的社会改革法恩赐给无产阶级。

但是被打入地下的党却延續着它那生气勃勃的生命。“紅色战地邮局”从不失誤地把工人群众战斗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送到最稠密的工人区。

恩格斯在评价俾斯麦的政策时指出，社会法对他在竞选运动中的帮助是不大的。恩格斯一八八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在写给爱·伯恩施坦的信中说：“……只有俾斯麦才会对一个甚至使用各种特别法令都镇压不下去的日益增长的工人运动干出这样的蠢事。目前，我們的人用强迫他实现他許下的諾言的办法来促使它尽量深地陷入这件事，这样做是对的；一旦这个家伙进一步糾纏在这个問題上（但是，他肯定不会那么快就做到），整个騙局就将会轉变成一种普魯士的警察統治制度。作为竞选綱領，这类空話对他不会有什么帮助。”①

《社会民主党人报》在揭露“甘餌”政策——俾斯麦的社会法——时，在一八八四年五月八日一篇題为《誰說了一，也就应当說二》的社論里写道：“原来这就是社会改革！反正是一样，无论俾斯麦先生的这种做法是否認真，他的虚伪总是需要他这样做的；无论他这样做是出于本心还是为了吹牛，也全都一样。他的謊言会变成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第414—415頁。

他自己将无法解脱的束缚他的绳索。”①

該报一八八四年十月（第四十和四十一号）在《各党派要求什么》的总标题下又刊载了一系列論文：《保守党人要求什么》、《国家自由党人要求什么》、《教皇至上党人要求什么》、《德国自由派要求什么》、《人民党要求什么》、《民族主义者社团要求什么》。第四十一号报上刊载了标题为《社会民主党人要求什么》的长篇論文，文章闡明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作为为反对资产阶级容克君主政体而斗争的战士、作为为美好的未来、为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斗争的战士的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同时也闡明了党最近的任务。論文在結尾时写道：“我们为反对軍国主义而斗争，我們揭露一切反动阴谋并高举政治自由的旗帜，因为政治自由是工人阶级經濟解放的必要前提。”②

社会民主党报刊的战斗宣传得到了工人群众的热烈响应。恩格斯密切地注视着工人阶级的斗争。他认为，在德国的宣传工作已經做得很不错了，虽然资产阶级报刊平常总是避而不谈这一点，只是由于工人阶级的政党迅速地为自己赢得了支持者，才不时畏縮地发出一陣哀鳴。恩格斯一八八四年二月四日在写给約·菲·貝克尔的信中說：“警察为我们的人开辟了广阔的活动場所，这就是到处不停地同警察直接进行斗争。这种斗争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总是获得巨大胜利，而且最妙的是，斗争进行得非常幽默滑稽。警察不但被战胜了，而且还受到嘲笑。这种斗争，我认为在当前的情况下是最有益的。首先它助长了青年人对敌人的蔑視。同我們进行斗争，再找不出比德国警察更不中用的人了。甚至在他們获得胜利的場合下，

① 《社会民主党人报》，1884年第19号。

② 同上，第41号。

他們也遭受着道義上的失敗，而在我們的群眾當中，對勝利的信心正一天一天地增強……。在所謂‘領袖’當中有很多是廢物，但是我卻無條件地相信我們的群眾，至於他們還缺乏革命的經驗，他們在同警察的這種游擊鬥爭中正越來越多……我們還從來沒有見過在這樣短的時間就學會集體行動和步調一致的無產階級。”①

恩格斯對工人階級力量的深信並沒有錯，他甚至在德國資產階級報刊的反映中也看到了社會民主黨的勝利。恩格斯一八八四年三月七日在寫給弗·阿·左爾格的信中說：“所有資產階級報紙對於我們的巨大進步，只有時刻唉聲嘆氣，他們都害怕即將到來的選舉。”②

選舉前一個月，〈社會民主黨人報〉在標題為〈十月二十八日〉的一篇簡短的战斗性社論里號召工人階級“提高社會民主黨人的票數。我們應當在鬥爭中取得勝利。”

儘管黨還處於非法地位，社會民主黨人在選舉中卻取得了巨大的勝利。投票贊成社會民主黨候選人的有五十四萬九千九百九十人，而在一八八一年的選舉中投票贊成社會民主黨候選人的只有三十一萬一千九百六十一名選民。

恩格斯在收到奧·倍倍爾關於選舉結果的電報以後，立刻（一八八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回復他說：“七點鐘收到你的電報，歡欣地讀了它……。結果超出我的預料……主要的是，選舉表明運動正迅速而穩步地向前發展……。我們的工人是好樣的！他們不顧政府和資產階級的一切詭計、威脅和迫害，多么頑強、多么堅決、特別是多么幽默地奪回了一個又一個的障地！”③恩格斯在給選舉勝利以應有的評價同時，警告伯恩施坦說：儘管群眾在選舉中把反社會主義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7卷，第355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給美國人的信〉，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67頁。

③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7卷，第421頁。

者“非常法”宣布为不能阻止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不中用手段，但是不应当因此陶醉起来，认为俾斯麦及其政府会放手，会把“非常法”予以废除。恰恰相反，倒会爆发更加残酷的斗争。

在社会民主党取得选举胜利以后，资产阶级政党以及俾斯麦本人开始向国会的社会民主党党团讨好，好使社会民主党的二十四名議員不至于破坏国会中资产阶级容克式的寬容和德行。恩格斯估計到会出現这种危险并且知道党团里有机会主义分子，在一八八四年十一月十八日的信里警告奥·倍倍尔說：“德国无产阶级已經成了一个强大的政党，让它的代表們无愧于它吧。”①

选举表明：无产阶级采取順从、采取向敌人让步的办法是什么也得不到的。只有頑强抵抗，党才能在残酷的斗争中获得胜利。只有当敌人看到工人阶级有力量的时候，敌人才会尊重工人阶级；但是，如果工人阶级一让步，一走上机会主义的道路，工人阶级就什么也得不到。恩格斯写道，应当让敌人通过天鵝絨手套感觉到鋼鉄般的手，而且一定要感觉到它。

正如恩格斯一八八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在給奥·倍倍尔的信里所說的，在国会中将会异口同声地叫嚷：“是的，如果社会民主党人同意遵守法律和放弃革命，那么，我們就贊成立刻废除反社会主义者法。”但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党团不能而且沒有权利走上遵守资产阶级法律的道路，“順从的回答将立刻把选举带来的巨大成果給毀掉”②。

的确如此，恩格斯沒有錯。十一月二十六日俾斯麦在新选国会开会时发表演說，就称社会民主党党团为“十分有益的成員”。甚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7卷，第432頁。

② 同上，第429頁。

至普特卡默在发言中也說：社会民主党人轉到不大革命的道路上了，还說，其实，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只是对付无政府主义者的。但是他沒有坚持到底，他把杀死普魯士特务警察之“父”普姆卜弗的事件归罪于社会民主党。

恩格斯写道：社会民主党党团中存在着机会主义者，他們受到俾斯麦和资产阶级报刊的竭力逢迎；这些机会主义者坐在議会的軟椅上，忘記了资产阶级容克帝国的議會是一个斗争的場所，而不是一个和平共处和进行亲密无間的立法活动的場所，忘記了在国会里将有人收买他們，給他們造成一种幻想，似乎通过和平的道路就可以实现社会民主党的全部任务和理想。在党团的成員里的确存在着这样的机会主义者，而且，正如恩格斯所預料的那样，很快就暴露出来。

恩格斯預先向奥·倍倍尔指出了这种可能性，并且呼吁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应当真正代表德国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

恩格斯的警告是完全正确的預言，社会民主党党团很快就不可避免地遭受到政治上的考驗。

在国会里討論“航运补助金”时，党团中大多数机会主义者的面目便明显地暴露了出来。

“航运补助金案”

八十年代初期，日益增强的德国资产阶级决心也走英国、法国及其它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早已走过的那条掠夺殖民地的道路。一八八四——一八八五年，德国在西南非洲侵占了一部分領土并宣布該領土为自己的殖民地。政府要求国会拨款給被征去扩大同殖民地的关系并从殖民地运回貴重原料的輪船公司。

俾斯麦提請新国会批准的首批法律草案之一，就是補助与东亚、澳洲、非洲經常通商的輪船公司以四百四十万馬克的撥款案。社会民主党党团有可能在討論这一問題时利用国会讲坛揭露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但是党团不仅沒有这样做，而且完全动搖了；照恩格斯的說法，机会主义分子，那些不折不扣的庸人，是想向政府表明，他們已放弃革命斗争而支持资产阶级的法律。社会民主党党团大多数人（奥艾尔、狄茨、弗劳姆、格里林伯格等人）不是在国会讲坛上揭露德国资本家力图用捐稅剝削劳动人民，并使用所得撥款去控制殖民地土著居民的掠夺計劃，却反而投票贊成把所需款項撥給政府。

恩格斯向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闡明了党团应当采取的策略。他在一八八四年十二月三十日給奥·倍倍尔的信中坚决地抨击了妥协主张，并且指出了妥协将会造成的后果：“如果资产阶级由于你們的贊成票而获得了補助金，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这簡直是难以想象的恥辱！……誰在这种情形下投贊成票，誰就一定会投票贊成殖民地。”①

在恩格斯指示的影响下，〈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編輯部刊载了几篇抨击机会主义的論文。报纸表示反对党团中的妥协派；经过四星期的斗争之后，取得了胜利。恩格斯一八八五年六月初断定說：

“我們在整个战綫上胜利了。”但是这个胜利是经过很大的努力才取得的。

恩格斯完全正确地賦予航运補助金問題以原則性的意义。正如弗·梅林所說：“事情在党内引起了热烈的爭論，引起了一般发生在反社会主义者法实施期間的那种最尖銳的爭論”②。这不是偶然的。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7卷，第443頁。

② 梅 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4卷，1922年版，第279頁。